

悲悯

宏博的人道主义随笔

BEIMIN
HONGBO DE RENDAOZHUYI SUIBI

谭元亨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悲悯

——宏博的人道主义随笔

BEIMIN
JOURNAL OF RENJIAZHUYI'S SPIRIT

谭元亨 著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悯：宏博的人道主义随笔 / 谭元亨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495-2465-5

I. ①悲… II. ①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43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5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真正进入人道主义的思考,是在30余年前即改革开放后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年代的末页》,于1980年被扣上“整个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帽子从而被尘封之后。坦率地说,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涉猎人道主义的相关理论著作。1979年4月14日平反出狱后,我便一口气写下这部长篇,年底即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全书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几个连环冤案的反思。从理论层面而言,我不可能有什么功底,全书甚至没有出现“人道主义”这样的字眼。

但作为一个作家,对那样一段历史的非人性的、反人道的惨剧,无疑是有深刻体会的,作为“在场”者,怎能不提出抗议?

也正由于这一原因,10多年后,我又深入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广州南石头实施的杀害了上十万粤港难民的细菌战大屠杀的调查中。也只有这个时候,我的人道主义史观才确立起来。其实,南石头的大屠杀,其反人类罪行,绝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与奥斯威辛的屠杀犹同出一辙。有人说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也就是说,奥斯威辛的罪行,与南京大屠杀不同,但是,有了南石头的细菌战大屠杀,其罪行则不再有什么性质区别或轻重之分了。因为南石头屠杀就是种族灭绝。我们可以从日军的文件中看出,他们对“支那人”的仇视,与纳粹对犹太人并无两样,更何

况要对驱逐出香港的难民杀绝,不让他们进入他们已“治理好”的老占领区的做法,不跟把犹太人赶进“隔离区”再送毒气室一样么?

这难道不是种族灭绝的表现么?

将160万港人“压缩”到不到60万人,特地于东京运来沙门氏菌以实施大屠杀,阻止大批香港难民进入广州而设立南石头难民营,这一切与我们在欧洲相关屠犹的资料中见到的,何其相似!很可惜,在这一罪行发生了70年,被揭露近20年之后,我们却没有再进一步发掘,尤其是深一层地思考。南石头大屠杀本身,它的历史建构,无论从中、日及世界三大层面上的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菌战与毒气室,它们的“科技”含量,那种“批量”的、程序化的、冷静的杀人……有谁去深究过内中的“人性”呢?在一个民族有了被屠杀的记忆之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继续思考它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即正义、良心、平等、民主、自由,尤其是人道主义的关系呢?

思想只能从历史中产生。

深邃的思想只能从历史记忆、民族伤痕中生发出来。

或许,被扣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罪名的那部长篇,虽然它不曾用过“人道”二字,但它激发的,不正是人道主义的思考么?

所以,它才触动了某个敏感的神经。

今天,人道主义已不再是异端邪说,更非大逆不道了。为了纪念当年的遭遇,我才加上“宏博的人道主义随笔”的副标题。当然,这部随笔所选入的,自是与人道主义相关的文章,有对不同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反思,只是,它远非一个有可能的历史建构,我只是率性而为罢了。但愿人们能从中感悟到什么,善莫大焉!

目 录

第一辑

黄秋耘：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	/3
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	/16
北南二秦：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	/31
朱崇山：文学，历史的“未尽之言”——评《鹏回首》	/53
韩素音：爱情、历史与文化泥土——评韩素音长篇小说 《瑰宝》	/61
刘荒田：本真、本色、本能——读《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	/70
张资平：涂抹在非体制自由知识分子脸上的“油彩”	/78

第二辑

人道的缺失与教育的无奈	/95
构筑精神的长城	/112
过滤历史	/118
我的精神故乡——六十抒怀	/128

良知与感悟	/135
炎帝陵前，一位“游乞僧”的沉思	/145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	/156
人道与儒学的生态伦理	/169
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卓然之则”	/176
确立宏观的再分配机制，遏制社会分裂与对立	/183
正视“三失”（政权失控、法律缺失、道德失范）	/190

第三辑

漂泊者的呓语	/197
旅 缘	/205
我的父母之邦	/209
失落与追寻——炎陵山纪胜	/216
我与瑟堡的细雨	/228
监狱之岛与世界文化遗产——记南非圣赫勒拿湾上的罗本岛	/238
始兴：不可镂空的历史	/244
“自梳女”与“老姑婆”	/257

第四辑

“不卖祖宗言”	/267
寻找客家人心灵中的圣典	/281
“高举骨头”：史识与诗情——原序	/292
天涯浪子——后记	/306

第五辑

《东方奥斯威辛》前言	/315
后奥斯威辛时代与“第三种人”	/325
关于《东方奥斯威辛》与角川的真实性——致陆川	/334

第六辑

并非童话	/341
自造的神话	/344
为名所累	/346
超于毁誉之上	/354
“公众人物”辨	/361
忠言逆耳与好话背后的杀机	/366

第一辑

黄秋耘：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

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

北南二秦：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

朱崇山：文学，历史的“未尽之言”——评《鹏回首》

韩素音：爱情、历史与文化泥土——评韩素音长篇小说《瑰宝》

刘荒田：本真、本色、本能——读《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

张资平：涂抹在非体制自由知识分子脸上的“油彩”

黃秋耘：困獸猶斗的人道主義者

黃秋耘这个名字，在中国 20 世纪文坛中意味着什么——纵然他活到了 2001 年 8 月，超过这个世纪有八个月。

躊躇再三，终于找到了一个几近无奈的借代词：困獸猶斗的人道主義者。

一如他的自述：“我一生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多，但是拿笔之后的迟疑和勇敢却比拿枪的时候多得无法比拟。”而他的迟疑与勇敢，又为的是什么呢？

自然都为的是人道主义，为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坚持与张扬，而他却每每为这碰了个头破血流。在 20 世纪的中国，人道主义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话题，如同梦魇一样，压得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勇气的文学家（这里且用“文学家”这个词，因为“作家”一词已用得太过滥了）无法喘过气来，一闭上眼睛，便是无边无际的猩红。一般人难以明白，“人道主义”这个词，为何非要被冠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定语才可以获准通行，否则，便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了。即便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当日，这样一个词的使用也仍要被视为左道旁门，乃至离经叛道。一个世纪了，人道主义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死于这个世

纪刚刚结束之际的黄秋耘，他又能享受怎样的命运呢？

谁能回答？

从他的简历看，他是一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我曾写过当年香港的秘密大营救，写过著名的抗日雄狮东江纵队，那当中都少不了他。这便是他一生辉煌的起点，但反对法西斯，对法西斯的反人道、非人性的暴行的清算，自然把他导向了人道主义、对人性的张扬，而这却又成了他一生黯淡的落点——时至今日，人道主义何时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得到过正名呢？

他只是困兽犹斗罢了。

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困兽”便是“一只古怪的猫”，一只讲“猫道主义”的古怪的猫，最后不得不被主人收拾了的“无用的猫”。这便是他的悲剧，尽管他在《古怪的猫的自白》中窃窃自喜，“这只古怪的猫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并没有把自己的同类当作老鼠来吃掉，发了疯的不是这只古怪的猫，而是把同类当作老鼠吃掉的猫”。

就这样，我总算确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写下标题，我的心就碎了，欲哭无泪。

秋耘老师过世已有半年了。他过世的时候，我正在南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回来后，听到这噩耗，当时就傻了。因为还以为能与他再一次促膝长谈，听听他那充满哲理与智慧的妙语，追忆那些回风舞雪的岁月……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再了，上次“不要愧对你经受的苦难”，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嘱托。

只是，我能做到么？

连为他写这篇文章，我都几番提笔，几番放下。我当写什么呢？我想写的，未必写得下，而我不想写的，又写它做甚？直到这次顺德城庆，应邀到会的国内几位文化艺术界的顺德籍友人聚在一起，感慨顺德一下子走掉了三位顶尖级的大作家——龙江的黄

秋耘，桂洲的草明，以及作为“顺德女婿”的张光年，有人问我：“黄秋耘与你是小同乡，你那两本七八十万字的厚书，他都读完了，而且向不少人推荐过，你为什么迄今仍不著一字？你对得起他么？”

当时，我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我该遭到指责——半年了，我怎么就不著一字呢？说什么也该有片言只语呀！不可以再拖下去了。况且，草明与张光年，我多少还写下一些文字。记得，晚年致力于写工人的草明，仍少不了受到“小资情调”的指责。至于张光年，在反“自由化”中的遭遇，就严重与惨烈得多，我手上有他的《文坛回春纪事》，回春也少不了倒春寒。相比之下，黄秋耘的经历更曲折一些，艰难得多，而他与我的关系，却又密切得多，我却仍这么一再踌躇。

仍是一个“难”字了得？

不，不，不。

无论如何，我是该写了，写不写，在于我，在于我的心，至于人家发不发，那就不在我了。当然，尽量能发的好，也只能这样，哪怕是片言只语。

回到家，拿起他的旧信笺，读到“手款及大作两种已拜读。……我的身体比去年略有进步，但年迈久寒，懒于出门行走，乞谅”，眼又湿了。这是1998年12月7日的来信，其时，《潘汉年》《潘氏三兄弟》两书，后一本刚出没几天，没想他便读过了。我还说，还有第三部《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正在修订，到时，也算是个三部曲了，了结了我这一不大不小的工程。其实，三部都是80年代早就完成了的……然而，他已经读不到第三部了，而第三部的出版，恐怕仍遥遥无期。信末，他署的是“弟秋耘”，其实，他与我父亲是同年的，我是不折不扣的晚辈，而且是同一个乡里的晚辈，我也是顺德龙江人。

可我又能写什么呢？还是从这两本书说起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带着浑身的伤残及厚厚一摞书稿，走出冤狱，径直跑到了北京。秦兆阳当时是《当代》的主编，一下子便看中了我那部《一个年代的末页》，批了“此书可以立即出版”，还找我与责编龙世辉长谈了一下午。也就是改稿期间，我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季涤尘。两年多之后，当我在一家刊物发表关于潘汉年晚年狱中生活的纪实后，便收到了他的约稿信。1984年，我便完成了全书。然而，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此书的出版最终搁浅了。老季把书稿及当时一笔相当可观的退稿费交给我时，这么嘱咐过，你去重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们社太树大招风了，出不了；以后，要是出了，可千万要送一本给黄秋耘，他是你老乡，你回广州，一定要去看看他，代我问好。老季是《风雨年华》的责编，而《风雨年华》只出了薄薄一本，自然是真正被“腰斩”过的。因为里边说到老人家活到六十岁会是列宁，七十岁则会是斯大林，而八十岁就只能是他自己了之类的话，在当时老季没少受责难。

不仅《潘汉年》搁浅，《一个年代的末页》也一样，退稿费都没付——这对我已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没想到，老季的嘱咐，我却是十三年之后才得以照办——《潘汉年》是1996年底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该书的出版，责任编辑严虹——同我一样，当年的老知青了，也受了不少委屈甚至无端的打击，这里就不提了。本来，该社还准备连续出《潘氏三兄弟》等我的一系列作品，也因此只出一部就“腰斩”了——当是“斩首”吧，因刚出一部，还到不了腰。在此，我借此文，也向严虹表示深深的歉意。当《潘氏三兄弟》转到北京出版社时，我的责编丁宁（这位是丁东的妹妹，不是反右中的丁宁，特此说明）还惊诧地问：真的么？这么好的稿子舍得转出来？她不敢相信，可我却唯有苦笑。潘汉年多灾多难，连关于他的书稿，也要株连不少人。当然，这里我也应对

丁宁他们表示谢意，后来，像韦君宜的《思痛录》等，也是他们最后出的。

我终于不负老季的嘱托，让姚玳玫把先出的《潘汉年》送给黄秋耘，虽说在十三年之后，我已从湖南省作协调至广东高校。不记得是专门附上一份信函，还是就把老季所嘱之事写在了扉页上，很快，便接到了黄秋耘的感谢电话。他还说，自己算是潘汉年的老部下了，所以，更存一份感激之情。这才明白季涤尘嘱托我送书的原委。在这一段时间内，不仅接到不少电话，甚至有人登门拜访，一个个老泪纵横。我没料到，广州居然还有那么多潘汉年的部属。我告诉黄秋耘和其他人，后边还有第二部、第三部……而现在，第二部是出了，但第三部——这回，算真正“腰斩”了。

在黄伟经的《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中，我读到了他谈及《潘汉年》的一段话，那是谈到周扬、刘白羽没把黄秋耘划成右派的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周扬说不能划。另外，刘白羽本人恐怕也有点怕搞过党的情报工作的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在党内的关系很复杂，你看了《潘汉年》这本书就晓得。刘白羽也许怕得罪这些人，以后不管碰上哪一次政治运动都得提心吊胆。”

这段话很有意思，这也说明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到了何等地步。然而，并不等于说，搞过情报工作别人就怕，也不是这么回事，怕，同样也包含不信任。当年东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杨康华，曾打报告到广东省委，要调黄秋耘到暨大去当教授，结果，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书记区梦觉却不同意。后来，秦牧问区梦觉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黄秋耘这个人我知道。对他的学问、业务能力，我没有什么怀

疑,可以做教授。我所以不同意,主要一条,他有个最大的问题——不听话。”

连教授也当不成,所以,当教授的资格,第一条便是听话,至于水平、能力、学问什么的,都在其次了。因为不听话,便不再对此人信任——这恐怕又涉及人道主义问题了。对人自身缺乏信任,对人的尊严的亵渎,恐怕是众多人道主义悲剧的根源。“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猜忌、仇恨、争斗才造成的么?以至历史上种种可怕的酷刑都在其间复活了。

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会晤的机会,梅花村 37 号……不知怎的,是室内光线不好,还是别的原因,他给我的,始终是一副病容!我们在不少场合下见过,握过手,却未能深谈。而每次,我的心都有点战栗,不知他还有几天——也许他看出我的神态,后来信中才特意提到“身体比去年略有进步”以宽慰我。而他以病弱之躯扛到八十四高龄,也实不易,这是怎样一种生命意志?!在痛苦磨砺下顽强抗争的生命意志?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这是潘汉年 40 年代写给冤狱中的扬帆的,50 年代却成了自画像。后来呢,更成了无数人的慨叹……一见他,我便想到了这两句。

这当是纯粹的私人谈话,我不想被认为是与潘汉年当年部属情报人员的交谈——因为写了这些书,有人已认为我知道得太多了,处处设防了。

他问起我何以会选择写潘汉年,不仅仅是因为在茶陵洑江与

潘的“一面之缘”吧？我默然，他却有意提起我“文化大革命”中将半年多代课工资资助了一位同是顺德籍的艺术家，当时这位艺术家被当作“红皮白心”双开回了原籍。我点了点头，说我“文化大革命”中为上百位老干部、专家写过“翻案书”，他们有的当时便“甄别”了，但大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的，可一百个中只要有一个没平反，我就“有问题”，为此，还写过一篇《1>100》的杂文。我这么一说，他全明白了，摸了摸我的肩膀。我苦笑，说，你不也一样么？也许，这正是龙江人的秉性。他又问起《一个年代的末页》来，说不要仅仅送与潘汉年有关的书，别的他也要看。我告诉他，书迄今仍未出得了。他叹了口气，说，你这本书，还没出，名声就太大了，秦兆阳好心给你帮了倒忙。我说，后来，秦老师千方百计帮我找地方出，还嘱他儿子秦万里找个地方“悄悄地出了”，不能怪他。我只不明白，当日那位总编辑，自己是搞翻译的，译过莎士比亚的书，何以竟以“整个作品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罪名，禁了我这本书。他说，当领导的，已经不是从他个人出发，而是得从领导身份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他听到什么关于批人道主义的风声吧。我说，当时还是1980年底，并没有这一风声，批周扬是几年后的事。他沉默了，又是一脸倦容，我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书中连“人道主义”这个词都没使用，凭什么要扣这个帽子？我几乎是与1979、1980年同步写冤假错案的平反。

他目光一闪，就那么一闪，苦笑道：平反冤假错案，是要恢复公正，恢复执政党的形象，可说到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你选择这个题材，包括写潘汉年，就已经决定了你的所谓思想体系，不在于你用没用这个字眼。我说，我也想明白了，现在也不抱屈了，他们要戴我这么个七寸三分的帽子，我倒觉得多少有些恰如其分，而且还逼我下功夫去钻了一下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马克思